

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 沟通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进路研究 ——基于“什邡事件”的实地调研分析

李春雷 贾立平

摘要

中国正经历社会变迁之痛，突发事件频发，每一起重大突发事件都夹杂着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激进博弈和对撞。笔者选取“什邡事件”，以大样本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为基础，并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分析发现，为建构自身表达空间，争夺“场域中力量的构型”，高度分野与对撞成为突发事件中两者沟通的显著表征。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看，传统媒体报道风格的固化，报道信息的真空以及报道框架的极化引致了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之间的自动区隔、横向比较以及偏见冲突，是两者沟通失范的症结所在。失范的原因还在于两者之间缺乏一种具有平衡和对接意义的共通感，因此有权威性的传统媒体应从认知和情感等维度构建共通感，以期调试和弥合突发事件中两者的沟通罅隙，进而一定程度上弱化突发事件发生的强度和频度。

关键词

突发事件、传统媒体、舆论场、共通

作者简介

李春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首席教授。电邮：
lchl_first@126.com

贾立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室工作人员。

本文为李春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困难群体心理疏解与传媒引导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2CXW016）的阶段性成果。

The approach for traditional media to communicate Party media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field in emergencie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of "Shifang event"

LI Chunlei, JIA Liping

Abstrac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pain of social change and had frequent emergencies. Every major emergency mixed together with the aggressive game and hit between Party media opinion field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field. This article included a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Shifang ev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expression spaces and strive for “configuration of strength in the field”, the high degree of distinction and collision become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opinion fields in emergencies.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curing style and vacuum information with polarized in traditional news reports incur the segmentation,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wo opinion filed, which is the sticking point of communication anomie in two opinion fields. These two fields lack of common sense with balance and docking meaning,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media with authority should build the common sens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ommunity belief between two opinion fields in emergencies. Also, it can weaken th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of emergencies to some extent degrees.

Keywords

emergencies, traditional media, opinion field, communication

Authors

Li Chunlei, Chief Professor at the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ostdoct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lchl_first@126.com.

Jia Liping is from the Editor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This article is a staged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named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 the 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a 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mechanism of the mass media” (Project No.: 12CXW016).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亨廷顿,1989），当下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乌尔里希·贝克,2004）。这种破坏力量已为一系列由间歇性“上演”转呈为指数式“喷薄”的突发事件所印证，成为中国高风险社会的强信号。对频发的突发事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一，每一起重大突发事件都伴随着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激进博弈和急遽交锋；其二，每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媒体均陷入“习惯性缺位”的泥淖不能自拔。本文以突发事件为切入口，通过厘清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三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建构多维共通感的角度探寻粘合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普适性路径,以便更好地应对乃至规避突发事件。

布尔迪厄认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构成了一个场域,社会场域是由许多不可化约的社会小场域组成的,各场域都有自己的自主性(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132)。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场域中,分野出的网上舆论和党媒意见各自为阵,相互交锋才制造出的信息不对称,文章所指的党媒意见是指党和政府借助政府公告、法律规约、新闻发布会、官方媒体等传播载体传达公共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所形成的带有官方立场的话语场域。网上舆论则是指民众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载体,就公共事务和公众利益表达态度、观点、情绪而形成的带有草根性质的话语场域。不同的舆论主体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建构着对事件的理解和认知,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之间实然的沟通障碍,以及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媒体的不作为抑或少作为,不仅为突发事件本身添加了新的参与变量,还对突发事件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接两个舆论场是当下中国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弥合社会观点冲突和分歧的应然之举。

一、事件回顾与样本特征分析

2012年6月29日,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钨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举行开工典礼,当地政府官方微博“活力什邡”以“中国六个一流”介绍了项目概况并展望了其美好前景。与此相对,什邡市民在百度贴吧,QQ群等网络论坛质疑项目环保问题,两个舆论场对峙的雏形初显。6月30日到7月2日,当地部分民众接连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上访、示威,并最终引致警民暴力冲突。在此过程中什邡政府三次表态,两个舆论场的交锋不断升级。随着该项目的被迫叫停,两个舆论场的碰撞才暂趋平缓。

什邡事件发生后,笔者与调研组意识到该事件的敏感性和典型性,对其进行了持续地跟踪关注,待事件“平稳”后,于2013年1月10日至1月16日深入当地进行实地调研。鉴于什邡市委门口和宏达广场两地均为什邡事件的发生地,因而调研组分别把什邡市委所在街道和宏达广场作为调研中心并向四周辐射,采用科学分层抽样方法选取调研地点。

首先,以什邡市委所在街道亨江东路、西路作为调研主干道,并向荃峰北路、通站东路等处延伸,对沿街店铺人员、什邡中学学生和教师、什邡宾馆的工作人员等发放问卷并作一对一深度访谈;其次,调研组还以宏达广场作为实地调研的第二

轴心，着重对广场及周边的金河小区住户、天鹅宾馆的工作人员等发放问卷并作相关访谈。此外，考虑到什邡事件的特殊性和调研区域选取的合理性，调研组一方面对钼铜项目建设所在地——灵杰镇的村落进行科学编号，最终选取渔江村和银池村作为调研的村落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入户式调研和深度访谈；另一方面，对什邡市环境污染重镇——双盛镇的亭江小区居民也采取问卷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实地调研。

此次调研深度访谈对象62人，共实地发放问卷157份，回收问卷146份，回收率为93.0%。按填写缺失漏严重、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等标准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35份，有效回收率92.5%。样本特征如下：

表1 样本特征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男	60	44.4	15岁至20岁	49	36.3
女	75	55.6	21岁至30岁	35	25.9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31岁至45岁	35	25.9
农民	15	11.1	46岁以上	16	11.9
学生	45	33.3	文化程度	人数	百分比
工人	12	8.9	小学	9	6.7
医生	2	1.5	初中	45	33.3
老师	1	0.7	高中	55	40.7
服务员	6	4.4	大中专	22	16.3
公务员	3	2.2	本科	4	3
个体工商户	18	13.3			
公司职员	6	4.4			
自由职业	27	20	合计	135	100.0

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基本涵盖了各性别、各年龄段、各类职业、各种文化程度的调研对象，其中该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占了大多数比例，基于此，课题组所进行的调研数据和调研信息的分析与研究具备较强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由于“什邡事件”发生过程中鲜有传统主流媒体发声，根据实地调研前对事后纸媒关注情况的梳理（详见表3），课题组根据以往对突发群体事件实地调研经验，认为即使在事隔半年有余的当地，该事件仍然在现实中尚未“脱敏”，随后的调研经历亦证实了笔者的假设。因此在2013年1月11日晚上，课题组克服多重困难，对Zhao姓、Wang姓、Zhang姓的三位“体制内抗争者”进行了集体座谈和深度

访谈,通过之前的精心准备,课题组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规模、经过、持续时间、解决途径等做了详细的记录和了解,对同一问题三人不同回答等细节座谈内容进行了比照,并和随后的大范围的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进行了有效对比,进一步确保本次实地调研“一手资料”的真实有效。

本文选取什邡事件发生地及周边作为样本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由环境污染问题所引致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且呈现出其独特的规律性,且与以往其他环境风险类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不同,什邡事件的环境风险升级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集群行动,因而相关研究更具典型性和研究价值;其二,什邡事件中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交锋异常激烈引发社会的热切关注。在事件的发生地什邡,基层政府和民众都严重缺乏处理摩擦和示威经验,实地对两个舆论场进行深度关照和具象化的还原,能够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其三,传统媒体的介入失范对此次事件的走向和影响作用重大,对其进行学理的检视实属必要。

二、分野与对撞:突发事件中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问题聚焦

所谓舆论场,是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刘建明,2002:36)。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催生的便捷式、人性化媒介表达功能,实现了由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的渐进式的释放和漂移,依托于公共事务和公众利益表达态度、观点、情绪而形成的带有草根性质的舆论场正日益壮大。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139)。换言之,党媒意见和网上舆论的博弈和较量已然成为当下舆论走向的主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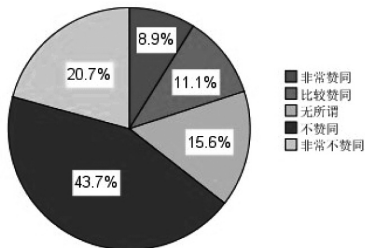


图1 民众对官方话语表达的倾向性分析

课题组通过长期的案例跟踪和实地调研发现,此次什邡事件更是上演了一场党

媒意见和网上舆论之间的激进博弈之战,分野与对撞成为二者之间沟通问题的主要表征。如图1调查数据所示,网上舆论对党媒意见的话语表达表现出明显的“不赞同”和“非常不赞同”倾向,二者的累积百分比超过64.4%,可见,从民众戾气表达和党媒意见一律更能呈现二者相对分野的场域格局。深度访谈中更有民众表示,“(地方)政府的话不能信,基层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网上舆论对党媒意见的怨怼和抵触情绪可见一斑。

(一) 暴政错觉: 网上舆论的戾气表达

互联网的兴盛,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国民社会阶段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新时期”(罗坤瑾,2012),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什邡市民关心自身健康,坚决反对钼铜项目建设,这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然而,现实社会存在公民维权意识高涨和合法维权渠道不足是一对矛盾,当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在体制内找不到制度化的发泄渠道,民众就会无奈并自发地转向虚拟的网络空间亦或采取极端行为表达合理的意见诉求,“发微博是民众没办法的选择。”¹具有相同观点、意见、态度的个体形成一定的“群落”,网上舆论场由此诞生。但是长期积压的“政治弱势心理”(李春雷,张剑波,2012)在群际感染和网络匿名性的助推之下演变为充满戾气的舆论表达。在对什邡事件参与者的深度访谈中,访谈对象就表示“我们觉得我们胜利了,我们很满意这个结果,我们给政府施加了压力”²,甚至这种只有暴力表达才能维权的“暴政错觉”在整个意见表达场域均较为普遍。

(二) 刚性维稳: 党媒意见制造“舆论一律”

“舆论一律”是指整个社会只有掌权者一种声音,仅允许媒体对社会事务表达掌权者的观点,不准公开表达任何与权力对立的意见(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2009: 256)。什邡事件发生后,出于刚性维稳的需要,什邡市政府动用一切手段进行舆论宣传,比如说李成金书记的道歉和讲话不仅在什邡电视台24小时不间断滚动播出(什邡电视台停播其他节目),而且在市区人流量较大的公交车上、户外电视上也高频率播放。“请广大市民朋友不信谣,不传谣”,“严禁非法集会示威”等成为党媒舆论宣传的主要指向。什邡政府通过这种行政干预下的地毯式宣传使得党媒舆论场的信息得以无限度的放大,并试图消解网上舆论场中的抵触意见从而达到“制造同意”的目的。当然,屏蔽和删截网上舆论的过激舆论表达也是党媒惯用的制造“舆论一律”的手段,而什邡市民则认为“事发后,(地方)政府屏蔽了我们自己的QQ群,我们发不出信息”³,自然也无法及时获知事件的进展,公众对事件核心信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自然会产生“信息剥夺心理”(李春雷,钟珊珊,2014),进一步

区隔了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

（三）惯性质疑：两个舆论场的沟通怪象

“惯性质疑，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但凡出现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公众总是本能地猜想其中的猫腻”（范正伟,2010）。笔者通过案例跟踪和实地调研发现，什邡事件发生后两个舆论场之间存在较为典型的“情绪性框架”。一方面，面对网上舆论正当的利益诉求表达，当地党媒却发表了“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的公开信，质疑什邡事件是“别有用心的人包藏祸心、捕风捉影地宣传该项目，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集访中共什邡市委”。似乎只要网上舆论出现针对党媒意见的极端化观点、意见、行为，党媒就会质疑其背后的动机，紧接着就会将部分人纳入“别有用心”的范畴，而民众则被扣上“不明真相”的帽子。同样地，只要是党媒发出的信息，网上舆论都会“惯性质疑”。什邡政府即使亮出国家环保局的环评合格证书，民众仍然表示“我们对（当地）政府的话半信半疑，复合肥污染很大的，环评证书一定有水分”⁴；而且尽管当地政府已经承诺今后不再建设钼铜项目，但是民众质疑的舆论依然随处可见，“（基层）政府说的话是骗人的，以后肯定还要建”⁵；事件中多重惯性质疑的意见表达，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两个舆论场间碰撞的浅层关系。

（四）零和博弈：网上舆论倒逼党媒意见

“根据参与者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也称零和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⁶。这是一种将单独一方利益极致化而互不相容的状态，两种场域的相互博弈和牴牾贯穿事件全程。以钼铜项目开工典礼为肇始源，民众经历了从线上意见表达和质疑走向线下舆论声讨和行为抗议的激化过程，而以基层政府、官媒为代表的党媒主体则从最初对该项目大力支持与盛赞的舆论造势，到呼吁民众“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的信息传递，再至最后被迫宣布“什邡市不再建设宏达钼铜项目”。在这场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激进博弈中，网上舆论以强大的聚合效应对党媒意见形成深层碰撞的倒逼之势，什邡事件最终以党媒的妥协而告罄。

三、传统媒体的错位与失范：两个舆论场沟通失衡的症结分析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归属于一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或者说是一种共享的集体表征”（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4）。随着民众“底层认同”的不断扩大，“中层认同”的不断流失（冯士政,2011），网上舆论与党媒意见间的社会认同正

面临着诸多纷繁复杂的沟通失衡风险。然而“当下又是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大众传媒拥有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李春雷，2012：85），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都无法回避大众传媒这一重要因素。课题组通过对于媒体报道文本和实地调研发现，在什邡事件发展前后，传统媒体通过记忆的唤醒、信息的真空、极化的框架，助推了网上舆论与党媒意见间的区分、比较、冲突。传统媒体介入的错位和失范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二者间的隔膜、断裂，并且也使其在党媒意见“场域”的权威地位愈发不稳。

（一）报道风格的固化唤醒“集体记忆”

笔者所言的“报道风格的固化”，主要是指传统媒体在长期新闻报道中所形成的报道内容、报道立场、话语方式的模板化和浅表化。“当代中国的传统媒体是一个内嵌于特定政治体制框架的媒体系统。在这一框架内，媒体的舆论表达是有选择性的，受其外部约束结构的限制，社会舆论被高度政治化，媒体舆论也严重政治化”（吴绍忠，李淑华，2008）。传统媒体的舆论表达一直沿袭“报喜不报忧”的惯常套路，钼铜项目开工典礼举行前后，网上舆论中的忧惧情绪已经开始发酵和蒸腾，而当地传统媒体《四川日报》并没有就“项目是否对环境引发污染”进行答疑解惑。恰恰相反，7月1日该报在头版刊文称赞该项目具有“造福百姓的重要作用”，其观点表达完全没有摆脱“官老爷”的身份和腔调，加之什邡电视台在事件发生前后始终一边倒的为党媒宣传造势，势必唤醒了网上舆论的“集体记忆”——“传统媒体与党媒是完全一体的。”⁷

刘易斯·科赛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李若建，2005）。当地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再次扮演了党媒意见的“传声筒”角色，“媒体与政治联姻”这一集体记忆一旦被唤醒，网上舆论便会自动地与党媒意见、传统媒体进行区分，符合网上舆论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强化，积累集聚相关有利资源。处于网上舆论中的民众在进行相关观点、意见、态度表达时，会进一步缩小群体间的差异性，最终对党媒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产生对抗式的解码。调研数据表明，民众对传统媒体报道该事件的满意度和对党媒言论表达的满意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见表2，相关系数0.369， $P < 0.01$ ）。换言之，对官方言论表达持不满意态度的民众同样对传统媒体的报道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可以说网上舆论对党媒意见的不满波及到了传统媒体。

表2 对传统媒体报道的满意度和党媒言论表达的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对官方言论表达的满意度
您对传统媒体报道该事件的满意度	Pearson 相关性	.369**
	显著性（双侧）	.000
	N	135

而且在深度访谈时，绝大多数访谈对象不约而同地认为“报纸、广播、电视台都是为（地方）政府说话”。可见，当地传统媒体报道风格的固化不仅唤醒了网上舆论的集体记忆，并且某种程度上再次固化了这种认知，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网上舆论对传统媒体的疏离和排斥，加大了两个舆论场沟通的难度。

（二）报道信息的真空增加沟通成本

传统媒体特别是地方传统媒体的媒介监督权长期受到行政权力的绑架和掣肘。什邡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继续像往常一样“集体齐喑”，直到新媒体发力致使该事件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之后，才陆续有部分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但报道内容流于什邡市政府暂停钼铜项目建设、承诺今后不再建设该项目等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都有安全的需求，危机事件发生时，“群体的心理倾向因受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使得对于政治等相关议题变得比较敏感而脆弱”（李春雷、张剑波,2012），民众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促使他们急于向权威媒体寻求真实可信的信息以消除紧张和不安感。

“沟通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孟卧杰、朱晋,2011）。传统媒体的信息真空致使两个舆论场最直接最原始的沟通渠道受阻，而经过网络 and 人际等泛传播语境的信息保真度又大打折扣，两个舆论场在信息失真和错位的情境下再进行沟通，沟通成本和难度自然会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真空所引致的网上舆论信息弱势，与党媒意见的信息优势形成强烈对比，在这一比较中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其直接结果是民众对基层政府乃至传统媒体的不满和不信任，网上舆论的群体焦虑情绪便会在网络谣言、流言的扩散中无限放大。

实地调研发现，当被问及“您主要通过哪种方式获取关于什邡事件的信息”时，39.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网络，而只有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报纸，这一数据从侧面折射出传统媒体公信力和沟通力的显著下滑。另外，45.2%的被调查者对传统

媒体“不满意，事发前后都不能第一时间报道事件，关注相关方的诉求。”显然，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的信息真空这一不当作为，不仅增加了两个舆论场的沟通成本，自身也丧失了答疑解惑，沟通民众的契机，从而陷入媒体公信力的合法性危机。

（三）报道框架的极化消解沟通可能

我国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从“蛊惑与教唆”框架到“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再到“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的转化(曾庆香,李蔚,2010: 202)。什邡事件中，面对网上舆论借力新媒体显露出来的汹汹之势，传统媒体也开始积极应对，但是这种应对表现在对“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的极化运用上，有失偏颇。高度语境化的追问导致一种对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完整、真实的认知结果，那就是承认群体性事件是社会中的结构性紧张与怨恨的结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冲突与怨恨”报道框架(曾庆香,李蔚,2010: 201)。笔者对什邡事件中表现活跃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异地纸媒（本地纸媒在事发后始终处于失语当中，故不作分析）的报道进行了搜集和整理。通过分析《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纸媒的报道文本发现，什邡政府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标靶”，官民冲突成为报道的绝对主题（见表3）。传统媒体报道框架的极化进一步会夸大凸显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差异，加剧网上舆论对党媒意见的偏见。在新媒体同频共振的作用影响下，更是引爆网上舆论的对抗情绪。

表3 纸媒对什邡事件的关注情况

纸媒	时间	文章标题	主要内容
《环球时报》	7月3日	《什邡事件的启示》	指责什邡政府忽视民意
	7月4日	《希望什邡是吃一堑长一智》	指责什邡政府与民众沟通不足
	7月5日	《什邡事件善后应依法处理6名被拘者》	呼吁什邡政府合理善后
	7月6日	《什邡事件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	呼吁不应鼓励学生参与冲突
《中国青年报》	7月4日	《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	指责政府对传统媒体的管控
	7月9日	《四川什邡蓊县事件官媒错失舆论引导良机》	指责官方媒体的不作为
《新观察》（杂志）	7月1日	《什邡政府的败笔败在哪里》	指责什邡政府忽视民意
《晶报》	7月3日	《什邡市民集访事件: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	反讽什邡政府的作为，反向支持民众
《东方早报》	7月3日	《什邡钼铜项目引发市民聚集 特警使用催泪瓦斯》	集中报道官民冲突
《中国经验报》	8月1日	《四川什邡群体事件真相调查》	指责什邡政府怠慢民意

传统媒体本应及时回应网上舆论对钨铜项目是否有污染，今后是否还会再建，在哪里建设等疑虑，而不是放大情绪，加深对峙。调查中在问及“您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对什邡事件有何认识”时，54.1%的民众选择“政府应该事先做好沟通工作，更加重视民意”（见表4）。由此可见，传统媒体的冲突展示报道框架催生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怨恨消极情绪，最大程度降低网上舆论与党媒意见间的认同程度，严重消解二者理性沟通的可能。

表4 接触传统媒体报道后的认知

		频率	百分比
看过传统媒体报道后，您如何看待什邡事件？	政府事先应该做好沟通工作，更加重视民意	73	54.1
	相比过激行为，民众可以采取更好的方法表达意见	18	13.3
	事件双方都需要认真反思	28	20.7
	清楚认识了该项目，学到许多环保知识和法律知识	16	11.9

四、认知与情感：传统媒体沟通两个“场域”的进路考量

如果按前述布尔迪厄“场域”的概念来思考实地调研中的问题的话，不难发现，传统媒体在“网上”和“党媒”两个“场域”中的作为虽不是单独的个案，却是在众多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典型败笔。可以说，什邡事件中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之间的牴牾与传统媒体的消极甚或不作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方周末》刊文说，自从这次群体抗议事件后，什邡成为全党“反面典型”，甚至什邡的后遗症是“整个国家的困惑”。什邡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什邡在自身形象重建上还遭遇诸多困境就说明了这一点(严定非,2014)。

课题组认为，以什邡事件为典型代表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传统媒体以权威立言和定调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两个舆论场的对峙和升级虽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传统媒体在其中的表现难辞其咎，而传统媒体自认为“常态出演”的“冷处理”的办法，其背后则必然有着强大的认知和情感体系。Scheufel亦认为舆论的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和情感维度（Affective Dimension）(Scheufel,1999)。这为传统媒体如何在党媒意见和网上舆论之间构建“共通感”的维度问题提供了理论张力。

传统媒体在公众认知“共通感”的打造方面，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开拓。如什邡事件中，在被问及“什邡事件发生前通过传统媒体对该项目的了解情况”

时, 26.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了解, 只知道政府要建该项目”这一选项; 20.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常不了解, 从没听说过该项目”这一选项。可见, 对于可能引发环境污染和危害公众健康的大型化工项目, 传统媒体并没有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角色, 传统媒体的“传媒公共性”身份的脱节导致了公共性媒体生态的缺失, 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两个舆论场的分野与对撞局面。

课题组在什邡市灵杰镇的渔江村实地调研发现, 此次钼铜项目建设地和游行地点并未发生所谓的“邻壁效应”。什邡事件只是以环境污染作为一个肇始点, 两个舆论场对峙下的公众情绪化、极端化认知甚至已经和渔江村要建大型钼铜项目基本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 传统媒体在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完全能够有空间最大程度化解这一冲突, 舒缓网上舆论的“反体制化”认知倾向。

在破除“媒体与政治联姻”这一情感框架方面, 传统媒体亦应有着更多的思路。事实上, 李普曼所说的,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 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所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 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沃尔特·李普曼, 2006: 62), 这一“成见说”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发酵作用绝对不能小觑, 这种定性的“情感框架”一旦形成则会衍为一种权威性认知, 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它在第一时间左右公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态度以及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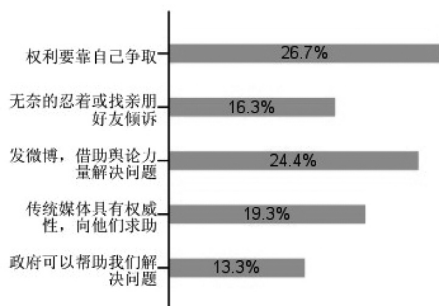


图2 公众对维护合法权益的选择路径

调研数据显示(图2), 通过“草根网民”自己争取和新媒体的舆论压力来维护合法权益的竟高达50.1%, 可见, 网上舆论明显存在这样一种成见, 即传统媒体与党媒的“场域”是一体化的关系, 甚至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联姻”。在这种成见引导下的两个舆论场的共通和信任日渐缺失。“草根网民”对媒体与政治联姻的过度解读所产生的成见致使涉及到基层政府和民众冲突的突发事件中, 民众宁愿相

信小道消息,已不把传统媒体的权威发布作为信任的渠道,宁愿通过线上抗议,甚至是网上集群行为,也不愿向传统媒体反映诉求,深度访谈中什邡市民都说出了“什邡媒体是党政机关的喉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⁸,什邡市政府通过媒体发布的信息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误读和不信任。

在破除“成见”思考中,显而易见的是,论坛、微博成为网上舆论的信息集散地,传统媒体的习惯性缺位以及与政治的纠缠不清使其逐渐被公众“边缘化”,传媒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传统媒体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疏离。传统媒体一方面需要积极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帮助党媒意见转变“控负”思维,努力挣脱对突发事件无法进行优先报道的制度桎梏,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在多元媒介环境下,一旦发生重大事件,瞬间就会形成纷繁芜杂的舆论场,碎片化的真相与集群化的流言便迅速传播,这时,传统主流媒体就要嫁接新媒体实现时效性的突围,第一时间发声,用真实、可靠、准确和权威的声音为受众解惑,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从而稀释网上舆论对“媒体与政治联姻”的成见,化解两个舆论场的沟通危机,合二为一,最终打造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唯一舆论场。

五、结语

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乌尔里希·贝克,2004:15),且“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紧张度正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势中”(葛琳,2008),在媒介生态变迁的场景下,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之间的博弈与张力愈演愈烈,成为突发事件蔓延的深层诱因。具有较强权威性与公信力的传统媒体,理应且亟需适切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共通感的打造调试和弥合两个舆论场之间的沟通罅隙,消弭社会风险隐患,促使突发事件最终能够“软着陆”。这一愿景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突发事件相关方的地方政府更应该敢于和善于“赋权”给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接受媒体的监督,通过与媒体的合作实现与民众的真诚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媒体都需要重视民意,为民众提供切实可行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如此,突发事件发生的烈度和频度才会有所缓释。

(责任编辑:徐智)

注释 [Notes]

1. 访谈资料16。2013年1月12日上午,亭江东路永丰巷某女个体商户。
2. 访谈资料42。2013年1月12日下午星河小区中年男工人(事件参与者)。

3. 访谈资料42。2013年1月12日下午金河小区中年男工人（事件参与者）。
4. 访谈资料58。2013年1月13日上午灵杰镇渔江村农民。
5. 访谈资料08。2013年1月11日某加油站女职员。
6. 检索于<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86.htm>。
7. 访谈资料37。2013年1月12日下午金河小区中年女工人。
8. 访谈资料54。2013年1月12日晚上亭江西路药店老板。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2年).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1998).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曾庆香,李蔚(2010).《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Zeng, Qingxiang & Li, Wei (2010). *Mass incid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Beijing: Chinese Books Press.]
- 范正伟(2010年12月29日)“乐清命案”中有没有火药桶.《京华时报》,A02.
- [Fan, Zhengwei (Dec.29, 2010). There is no tinderbox in "Yueqing murder". *Beijing Times*, A02.]
- 冯士政(2011).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3),127-133.
- [Feng, Shizheng(2011).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class ident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China's comprehensive survey.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3), 127-133.]
- 葛琳(2008).网络舆论与网络群体性事件.《新闻爱好者》,(9),20-21.
- [Ge, Lin(2008).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mass incidents. *Journalism Lover*, (9), 20-21.]
- 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0年).
- [Hogg, Michael A. & Abrams, Dominic (2011).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0).]
- 亨廷顿(1989).《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版)》(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68年).
- [Huntington, Samuel (1989).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st Ed.)*(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8).]
- 李春雷(2012).《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媒介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Li, CHunlei (2012). *The study of Media Culture under Risk Socie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李春雷,张剑波(2012).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与传媒对底层社会的引导策略研究——基于东明事件的实证分析.《现代传播》,(6),42-46.

- [Li, Chunlei & Zhang, Jianbo(2012).The generalization of politically weak psychology and guiding strategies of media to the bottom socie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Dongming incident. *Modern Communication*, (6),42-46.]
- 李春雷,钟珊珊(2014).风险社会视域下底层群体信息剥夺心理的传媒疏解研究.《新闻大学》,(1),90-99.
- [Li, Chunlei & Zhong, Shanshan(2014).Research on relief of the grass-roots “information deprivation men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Journalism Bimonthly*, (1),90-99.]
- 李若建(2005).社会变迁的折射: 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5),182-201.
- [Li, Ruojian(2005).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Change: A study on the rumor of Hairy Man and Water Monster in 1950s. *Sociological Studies*, (5),182-201.]
- 刘建明(2002).《社会舆论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
- [Liu, Jianming (2002). *Principle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2009).《舆论学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Liu, Jianming, Ji, Zhonghui & Wang, Lili (2009). *Introd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罗坤瑾(2012).网络舆情监控与构建公共信息空间.《当代传播》,(6),71-73.
- [Luo, Kunjin(2012).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of network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spac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6),71-73.]
- 孟卧杰,朱晋(2011).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沟通障碍及其消解.《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39-42.
- [Meng, Wojie & Zhu, Jin(2011).Communication obstacle and digestion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Internet opinion crisis. *Journal of Sichuan Administration College*, (2),39-42.]
- 沃尔特·李普曼(2006).《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著出版于1997年).
- [Lippman, W. (2006). *Public Opinio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
- 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第1版)》(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2年).
- [Beck, Ulrich (2004). *Risk society (1st Ed.)*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吴绍忠,李淑华(2008).互联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3),38-42.
- [Wu, Shaozhong & Li, Shuhua(2008).Warning mechanism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8-42.]
- 严定非(2014年10月14日).什邡后遗症“这是整个国家的困惑”.《南方周末》.
- [Yan, Dingfei (Oct.14, 2014). Shifang after "This is the whole nation's confusion". *Southern Weekend*.]
- Scheufel, D. (1999). Deliberation or dispute? An exploratory study examining dimensions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1 (1), 25-28.